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六期 ——  
(二〇〇四年七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7b)

---

【春秋史笔】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	余英时
【前事不忘】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景凯旋
【挽救记忆】历史的义工王友琴	寒 山
【千秋功罪】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前朝旧事】聂元梓谈周恩来	行 云
【往事追忆】文革初期大学生造反原因与“北航红旗”的成立	老 田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春秋史笔】

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

• 余英时 •

王友琴博士这部关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专书（《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见本文后出版消息——编者）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她在一九八〇年便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资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并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过程。基本上她是亲自访问当时的学生和教师，先后共有上千人。大部份受访者以及死难者的家人，不是余悸犹在，便是受不了回忆的痛苦，因此开始都不肯说出真相，友琴必须耐心地作说服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才能打开访谈之门。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友琴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努力，尽可能地到各学校核对记录，确定死难者时间和事件始末。她调查的学校（以中学、小学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个省市。除了当面访谈之外，她还通过通信、电话和网络种种方式增补了不少资料。访谈和调查告一段落后，友琴又花了几年时间全面整理所有的资料，最后写成这部专书，包括六百五

十九位死难者的传记。

#### ◇ 成书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二万以上（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二〇〇一年下册，八百四十六页）。友琴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过是韩愈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干部之外，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成了无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将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从“身与名俱灭”的绝境中挽救了出来，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关于受难者的访谈后来虽扩大到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但主要对象仍是中、小学的教师。这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受难者中显然构成一特殊的“类”，本书关于他们的大量传记等于正史中的合传（如《后汉书》的“党锢列传”），为未来史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因为“文革”的波及面太广，如果对受害人物不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无法展开的。所以我深信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将来史学家无论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会史都不能不建立在这部专书的基础之上。

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便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从六十年代起，展开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后已出版了许多专书，这两处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传。对照之下，本书包罗的人物则多达六百余名，规模宏大多了。但本书所用的访谈和实地调查其实正合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孔子说，“文献不足，是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因为“献”指“耆旧”，即老人。老人传述的故事是历史的另一重要根据。所以司马迁撰史记列传，往往在传末（“太史公曰”）说明他调查访谈的过程。最明显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按：樊哙之孙”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卷三五）。

这不是和友琴的访问调查，先后如出一辙吗？《史记》中尚多他例，这里不必详举了。这一搜集活史料的方法，后世仍然沿用，特别是在宋以后的地方志中。例如民国初年所修《婺源县志》的“凡例”中便标明“采访员报”，可知其中不少事实是从调查访问中得来。我很高兴看到此书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这许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 ◇ 苏共体制与中共特色的可怕结合

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她是红八月的第一个牺牲者。当时友琴才十三岁，正在该校读书。这一惨绝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与恐惧。这才是本书从创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动力。我虽然当时身在海外，却也能间接印证本书的调查结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遗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亲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两次回到故居和他们团聚。我听到有关“文革”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学红卫兵打死校长、教师的情况，他们绘声绘影，描述得如临其境。最使我难忘是某一间中学（校名忘记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数字）的学生在教室中用钉板和皮带铜头痛打老师，血肉横飞，沾在四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一位侄媳妇，在安庆教中学。“文革”爆发后，她也是被学生打死的。当时

同行中有考古学家亡友张光直，早年在北京上过小学，和校长的感情很好。他听了我的转述，有点怀疑是不是事实。过了两天，他特别去探望了他的校长，回来后告诉我，这位校长的双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

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断绝过。晚明以来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民国以后则改为“天、地、国、亲、师”，为甚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过我愿意指出的两个关键性的事实：第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俄国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全面征服了中国；第二是这个征服了中国的“列、斯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又发展了更可怕的“中国特色”。

所谓“列、斯体制”当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极权统治，毋须多说。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里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ism）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事实上早在列宁生前，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一九二二年苏共的刊物上便开始攻击爱因斯坦和其它“唯心主义”的科学家了（见 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Oxford, 1990, p. 213）。

◇ “党天下”本质导致惨剧迄今不止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已一语道破，在文革期间他曾作自我评价，肯定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二八）他自封为“马克思”不过是自我陶醉，说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实。这里的斯大林不仅指人还指体制。秦始皇则象征了他的“中国特色”，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却偏偏在这四个字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所以在政治运用上，毛和他的“党”充分复活了中国专制帝王的统治手段，包括特务制度（如明代的东、西厂）、文字狱等。甚至毛语录和红卫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里找得到渊源。明太祖写过《大诰》三编，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从国子监到社学）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说：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岂不是“文革”时期的“红宝书”吗？《明史刑法志一》说：

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试想这和百万红卫兵人人手举《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呼万岁，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过一亿人上下，这十九万余人集会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较之百万红卫兵的声势一点也不逊色，所以毛的“党天下”除了外来的“列、斯体制”之外，其“中国特色”也同样不容忽视。“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无穷。而且不仅中国为然，前苏联的一党专政也同样有其“俄国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〇年俄国文学家米诺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尔什维克专政在理论上来自西方，在实践上则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历史文化的底层（见 Paul Miliukov , *Bolshi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 London, 1920 , P. 5）。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个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个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后来一位文学家曾假借十五岁学生的日记的形式创作了一本小说，描写学生如何横蛮粗暴和教科学的女教师最后怎样惊惶逃走，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唯一与文革不同之处，只不过学生没有动武罢了。（详见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vik Regime*, New York, 1993 pp. 318—9）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一九五二年陈寅恪写了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

证羊见惯借〔来且〕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详细解说见我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一九九八年页五四至五六）陈先生极为敏感，所以早在一九五二年已“一叶知秋”。十四年后学生打死老师的现象决非偶然，文革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所能掀起的。这一切都内在于“党天下”体制的本质。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十五年前天安门的一幕，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已变得若存若亡了，但还是有人不能忘怀。最近向“人大”“政协”上书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发行。初版定价每册 110 港元（15 美元），每册邮费 — 美欧、澳纽、日本地区空邮：15 美元；东南亚地区空邮：11 美元；东南亚地区平邮：8 美元。邮购者请注明姓名、地址、电话 / 传真及订购数量。支票付款者支票或汇票抬头请写 CELELUCK CO., LTD., 并寄：Rm 603, Opulent Bldg., 402 Hennessy Rd., Wan Chai Hong Kong。信用卡付款者请注明银行、信用卡号码：VISA（16 位编号）/ MASTER（16 位编号）、金额和信用卡到期年月，并传真：（852）2891 5591。电话联系：（852）2893 9147 或（852）2893 9197，电邮地址：open@open.com.hk。〕

□ 原载“新世纪”网站

~~~~~

## 【前事不忘】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 景凯旋 •

八十年代中，同几个朋友谈论《古拉格群岛》，有人建议，应当搞一种“公墓文学”，选一些文革中的受难者作代表，将他们的遭遇如实记录下来，分门别类，编成丛书，如教师公墓，作家公墓，演员公墓等。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并在纸上拟了一个初步的名单，甚至连书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个纪念碑，簇拥着白花，以示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后来这心愿没能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受难实录——我心里顿时充满感佩。1980年，她还在北大时，基于当时发表的文革行状与事实相差甚远，就已开始搜集撰写文革死难者的事迹。做这件事，对她个人没有什么好处，不能靠此升职称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称作“历史的义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后在美国见到面，更是感觉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朴素。房间里没有什么家什，书架上却堆满了采访记录的卷宗。据她说，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个小小的文革资料库了。

采集这些事例，想必花费了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于回避，不想让心灵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于害怕，因为那些迫害者尚在，并没受到任何惩罚；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反感，甚至质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是呀，为什么呢？要知道，文革已过去近三十年，早已盖棺论定，何必再让往事缠绕心头，就像文革后的一首歌所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对此她在前言里如是说：“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迫害，残害了许许多多的生命。尽管八十年代出过一些纪实文学，那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纪录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于实录普通人的受难，展示公开的虐杀，会让人们对文革的官方结论产生怀疑，其结果就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还没有一桩暴行像文革这样，大量的事实没有被记录下来，没有被公布出来，没有被讨论起来。

在前言里，作者还讲述了一则见闻，一名曾蹲过劳改农场的教师告诉她：在杀过牛的地方，牛群每当被驱赶到那里，便会哞哞悲叫，而在杀过鸡的地方，鸡群会照样嬉戏欢乐。对待死去的同类，作者正是选择了牛的方式。还有那些接受她采访的人，于牛与鸡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他（她）们也同样选择了前者。在作者心中，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气和信心。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为此，她感谢每一位受访者，感谢之前她们素不相识，如今通过访谈、电话和写信，却在一起追寻往事，分担人生经验。

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这样说过：“作家的作用与艰巨的义务紧密相连，正因为他是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可能为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服务，他要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加缪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分裂状态，所以他呼吁作家要有独立性，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写作。在当今中国，像加缪所说的那种作家和学者，可谓寥寥。许多知识人的文字，其实都是在为权力服务，或者为金钱服务。而王友琴的全部写作，却是为了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人，为了写出一部

受难者的历史。

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难中，人民又何曾创造过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英雄（权力者）创造的历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深入每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上至国家主席、各级官员，下至教师、医生、工人、农民、保姆和家庭妇女。但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却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难的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的生平（对于文革的发生，其实他们也有份责任），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恢复名誉。而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受难者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讲述他们，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镜象被歪曲，被遮蔽。

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将自己的遭遇视为当然。作者采访过一位中学老师，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关在一起，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他说既然国家主席都受到那样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师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也许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话感到悲哀，在这位中学教师的潜意识里，像他那样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过是“承受历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创造历史，也不奢望进入历史。他这样说，想必是出于无奈，“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从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于此，作者立志为这些普通受难者而写作，讲出他们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以记忆对抗遗忘，就更显出她的良知和勇气。

上面加缪那段话的深意还在于，只有关注和描写那些“承受历史”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了解真相，认清事物的本质。

《纪念园》分四个部分，有“受难者名录”、“死难发生地”、“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主页上写着“我们没有忘记你”，死者照片都饰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写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屠杀事件，但主要还是王友琴自己采写的实录。这些实录并不是单纯的资料，作者采用《史记》的互见手法，以专门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述。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岛》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除了调查不能周全，许多事未曾亲历，试图用一种整体的观点，将各种事件联结起来，也是原因之一。任何历史叙述都是拥有自身话语的叙事，王友琴女士的采访实录当然也不例外，她常将自己的思考贯穿其中，夹叙夹议，加以分析，堪称“发愤”之作，而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品质，还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用索尔仁尼琴谈自己著述时说的话来评价，那就是其中“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作者所记录的专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这些人中，有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教师孙历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师陈沅芷，北京八中教师华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需田，北京东厂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中科院考古学家陈梦家，气体厂工人陈彦荣，民国名人张东荪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铁宝，北农大职员何洁夫，北大教授吴兴华，北京玻璃设计院黄瑞五一家五口，陆军总医院医生刘浩，北京台型机床厂会计孙启坤，北京六中学生王光华……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他们中有的被打后自杀（很多自杀其实是虐杀），但多数是被直接打死的。当然，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写文章推算，受迫害的达一亿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万人以上。

而文革后各地编写的大事记里，写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经过的，相当罕见。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

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

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有一种说法，称文革是无政府主义，后来的当政者的诚惕心理无不渊源于此。但事实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红八月”中，红卫兵在北京城四处抄家打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966年夏天，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见《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自杀。“革命委员会”后来被彻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为“三种人”（他们当然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最初的红卫兵运动产生于1966年6月，由中学里的高干子弟发起。其活动从六月到十二月，横跨工作组和中央文革两个时期。工作组是由当时主持文革的刘、邓派出的，他们沿袭反右与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师、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五十天”。红卫兵创立伊始，认为这次运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目的是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于是在工作组的指使下，带头起来造学校干部和老师的反，并在七月份工作组撤出后，制造了“红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以后，由于父母受到冲击，这些红卫兵开始反对中央文革，遭到打压，遂告瓦解。他们的遭际反映了党的领导层对待文革的分歧，而对于许许多多普通人来说，无论是工作组时期还是中央文革时期，其悲惨命运都是一样的。

卞仲耘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个学生贴出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此后工作组进入学校，支持高干子女掌权，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都是四清对象”，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

卞仲耘被定为“四类人员”，罪名之一就是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因分数不够没被附中录取。在工作组对她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有的学生用民兵训练的步枪捅她脊背，倒地后又揪着头发拖起来，工作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泽东不满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其实那时打人已相当严重），工作组撤离学校，红卫兵独掌大权。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红卫兵的批斗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学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宋因此而将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个北京及全国。

文革甫起，老红卫兵一度成为革命的主宰，大肆宣扬“血统论”，所以打老师同学也特别狠。

这些红卫兵即使不去打人，也会成为当然的接班人，正如文革初清华附中的一张大字报所说：“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谁也没有反对他们接班！），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极度扩张的特权感，把打“阶级敌人”视为荣耀和考验，并且深知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惩处（事实上也是如此）。作者曾引用一个前上海中学红卫兵的回忆：“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在这样的“革命气氛”中，那些被红卫兵视作“黑五类”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从实录揭示的事实看，他们的罪名大多是因为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实录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层教育干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组定为“四类”，王光华和左奶奶的家庭成份是小业主，陈彦荣母亲土改时被划为富农，黄瑞五和孙启坤则是家有房产，陈梦家是右派，至于马大娘和李丛贞，一个是帮工，一个是工人，应当属于革命政权的基本群众。这些人在平时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从不对现实不满，也没招谁惹谁，即使出于发动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杀害她们不可的理由。但他们还是被权力杀害了，倒在历史的轮下，变成一道巨大的阴影。

对无权者的残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与之相比。受到历史决定论的召唤，纳粹以种族斗争的名义，要消灭犹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则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要消灭其它阶级。他们都号称要拯救世界，却蔑视“你不可以杀人”的人类古老律条，以人的血统分类，用鲜血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疯狂杀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谈到纳粹杀害犹太人的行径，汉娜·阿伦特写道，这是“任何实用目的都无法予以解释的一种罪行。”

这里除了一部分“人类”的权力傲慢和优越感，还有什么呢？说到底，文革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是党和人民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也不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而是权力者对无权者的暴政。这样的暴政常常并不出于任何实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只是缘于受害者的身份。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它“攻击人的差异，也就是说，攻击‘人的身份’特性，没有这种特性，‘人种’或‘人类’一类词便会毫无意义”。

自文革结束，许多受难者的家属一直要求讨回公道，试图在法律上追究具体责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来就是这样，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检察院先是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后又以属于“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而决定不予起诉。文革持续了十一年，然后又过了两年才被彻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已过了时效，但想来问题还是在“运动”一词，因为它涉及到最高权力者，也涉及到个人在政权名义下的行为责任。后者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可以暂且不谈。尽管如此，当年的打人者至少应当在道义上，向受难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宽恕。我们至少应当响应巴金的呼吁，将大量的文革暴行记录下来，公布出来，讨论起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让集体失语主宰我们，何来正义的伸张？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

就像布罗茨基说的，“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经由犹太幸存者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纳粹大屠杀和前苏联大清洗早已大白于天下，世上再也无人敢于公然为之辩护。但文革暴行却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这段历史成为空白，不到三十年时间，文革后的一代人对此已茫然无知。一些文革领导人和积极参与者也开始发表文章，为自己百般辩护，

以至在某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眼里，溃疡也变成了花蕾。我就见过国内一份有名的读书杂志，遮遮掩掩地讴歌文革中的农村民主，好像农村从来没有过批斗“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大兴县和道县的屠杀更是天方夜谭。而受难者历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谈理论的西方左派能够从全球文化革命的观点，去论证文革的历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讲，作家郑义撰文谈文革中广西的吃人事件，经瑞典一些报纸摘译发表后，几位社会学家竟批评说太荒唐，认为这是出于对东方民族的偏见。



看来有一天，他们甚至还会告诉我们，所谓文革暴行，不过是后殖民主义话语，是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

所有这一切，都更显出王友琴写作的意义。

2003年在美国芝加哥见到王友琴时，她正在联系出版书的事，说是北京有出版社愿意考虑。最近她来信说：“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已经发了广告，5月初印好。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50万字，有麦克法夸尔和余英时先生的序言。”末了，她又不无遗憾地加上一句：“在北京最后未能出版。那是一个35万字的版本。他们排了纸样，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不接受。”

没有受到历史追究的罪行是不会被宽恕的，更不会被遗忘。

那就让我们等待吧。

注释：

- 1.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二〇九期。
- 2.见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但此文从“继续革命”、“两个司令部”的思维范式出发，将工作组时期与中央文革时期截然分开，认为文革是中央文革支持群众反官僚的斗争，甚至是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尝试，但他却无法解释中央文革在“革命委员会”时期对普通人的残酷迫害。可见从权力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 3.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75.
- 4.同上，268-269。
- 5.前文革领导人陈伯达、王力等都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1996年4月10日，《纽约时报》曾发表对王力的整版专访，王力称自己对文革的所作所为不后悔。
- 6.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8期。

□ 原载“新世纪”网站

~~~~~

## 【挽救记忆】

历史的义工王友琴

• 寒 山 •

在本周的日历上，“五一六”是一个浸透了中国人的血和泪的日子。三十八年前的这个日子，被毛泽东把持的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一切代表旧思想、旧制度和旧文化的人和事的反。这些充满了暴力暗示的文字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大革命”中，数百甚至数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株连和迫害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对“五一六”这个日子还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或者起码的历史知识呢？如果做一项社会调查，相信一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对“五一六”这个日子反应茫然，尽管他们可能并非对文化大革命毫无了解。但如果对一个历史事件没有具体生动的记忆

和知识，那么这种了解就不能不是抽象的和肤浅的，作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记忆就不能不是薄弱和空虚的。对文革的这种并非空白但却十分苍白的集体意识，正是中共二十多年来蓄意淡化和压制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的恶果。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苍白的集体记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遗忘症，渗入了中国当代文化。

反抗暴政也就是反抗暴政所强加的遗忘。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师王友琴女士耗费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和对文革的这种集体遗忘症作斗争。这个月她将要到香港的开放出版社用中文出版一本题为《文革受难者》书。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在这本书中，王友琴追踪了七百名文革死难者和受迫害者的经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她第一手采访的结果。

王友琴对文革历史和真相的这种执着的追问开始于她的中学时代。在1966年夏天，她目睹了自己的同学和红卫兵殴打和侮辱老师和校长。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带和带钉的棍棒将老师和校长们打得死去活来，还用开水浇他们，强迫他们吃粪便。很多师长不堪残害和羞辱而自杀。这些血腥和残暴的场景在她心中留下的震惊和愤怒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反而随着集体遗忘的强化而日益增强。她下定决心，要为文革历史用受难者的生命来作见证。她说“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我相信，在海内外形形色色有关文革的描述中，王友琴女士的这两句话，将会经受住真相的考验，成为文革最精炼和最经典的定义。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嬉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是从一个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喂养牲畜的教师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研究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她为此付出的精力、时间和财力是难以衡量的。她先后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工作过，但她的这项研究并没有受到任何基金会的资助，这在美国从事相当规模研究的中国学者中是不常见的。我想或许这正说明了她这项研究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感谢许许多多被采访者和帮助她完成调查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在回答王友琴的感谢时说他是历史的义工。王友琴说现在她也以“历史的义工”自居。我想，如果中华民族真的能够维系自己的历史记忆并从苦难中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还有王友琴这样的“义工”在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地为我们劳动。

~~~~~

## 【千秋功罪】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问答选录

• 高文谦 •

〔原编者按：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应华光文化协会等团体之邀到新泽西演讲问答。听众提出上百个问题，从周恩来

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到该书资料来源、体例安排，书中“周恩来是文革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等提法是否妥当，等等，不一而足。多维记者根据录音整理了记录稿，并交高本人作了必要修订。)

◇ “文革”目的是打倒周恩来吗？

问：《争鸣》杂志上曾有一篇文章《文革的目的是打倒周恩来》，列举了不少事例证明这一点。你对此同意吗？当时戚本禹在北大一次群众大会讲话中，有意把周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你认为这是毛打周的试探气球吗？

高：毛发动文革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不是周恩来。在毛发动文革的格局中，周是不可缺少的借用力量，需要依靠他来维持局面。这正是周能够在政治上生存下来的客观原因。不过，毛对周不时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暧昧态度，却很不满意，时时敲打他，提醒他不要重犯以往在路线斗争中“调和主义”的错误。

二月逆流后，社会上掀起倒周浪潮，贴了许多大标语，指周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毛不满周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有意敲打他一下。江青一千人也想藉这个机会整一下周。戚本禹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讲话。周是否被打倒，不在中央文革，而在毛。我想毛那时并没有下决心打倒周，当时正是天下大乱，需要依赖周控制局面，这时候倒周，会自乱阵脚。

此外，与抓叛徒活动也有关系。当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六十一人集团，结果把周的“伍豪启事”也翻腾出来。当时周的地位一度似乎岌岌可危，周本人也很紧张，放下手上一切事情去查资料，连夜向毛写报告申说。当时是外交部保周的头面人物王、唐两位小姐，向毛写了一封信，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毛当时搞了两手：一方面对王、唐来信做了批示，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让文革小组向造反派做工作。另一方面，毛又把“伍豪启事”的问题挂了起来，批给文革小组留存，以此来要挟周，让他好自为之。周在政治上最不好过的日子，不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而是在林彪事件之后。

问：书中提到“周是文革的执行者”，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你认为他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

高：周是文革执行者的历史定位，是根据史实做出的判断。文革中，周一直处在第一线，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他先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被毛指定主持政治局工作，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二月逆流”后，党内元老派全军覆没，周又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被指定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主持在大乱之中唯一存在的权力机构。九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机构，他又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一直到1975年他病重为止。开展文革虽是毛的个人意志，却是通过党的正式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因此，无论周在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还是作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至于周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两种情况都有。

毛发动文革主要是通过两套班子：一是周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二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两者交错使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前后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前者主要是用来支应局面，承担组织工作，如检阅红卫兵，大串联等；后者开始主要是搜集情况，起草文件。后来，毛越来越倚重文革小组，通过它来指挥运动，权势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周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分工，有合作，有分歧，有妥协。

◇ 周恩来若抗争有无可能改变中国历史？

问：不知中共党内究竟有多少民主？假如周也像彭德怀那样抗争，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

高：中共标榜民主，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少得可怜，尤其是在文革年代，连周都不敢对毛讲出自己心里的看法，处处要看毛的脸色行事，更何况普通百姓。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的社会，皇帝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却不是精神上的主宰，历代皇帝还要去祭天祭孔。而毛不仅掌握有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而且是真理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至高无上的。在这种制度下，是根本出不了忠臣的，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如果毛是一个“明主”，周或许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忠臣贤相。可是晚年的毛偏偏又不是一个明主，非但把整个国家推向文革浩劫之中，而且周对他那样忠顺，他还不放心，还想整周。应该说，周还是想做一个好人，最终却做不成，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问：能否将周与中国历史代表人物比较一下？周的“忍辱负重”是否只是做高官的一种自我保护？

高：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著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虽然他恪守君臣之道的本份，小心翼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可以说，在共产集权制度下，是出不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即便象彭德怀那样进谏，也无法抗争到底，最后也还是违心认了罪。

至于应该怎样看周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问题，恐怕其中既有保全自己的考虑，不愿意革命一辈子，最后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也有老成谋国，想留在权力圈中发挥作用的想，用他自己的话是做革命的“弄潮儿”。在文革狂潮中，周在看出对毛的任何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又不忍坐视国家陷入大乱之中而不管，所做出的一种选择。我和别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周的要害是不愿出局，他很害怕自己落得像彭、刘、林那样的下场；他想影响历史，以为自己能把握好局势，在大乱之中，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周选择留在权力圈内，就不得不跟著毛在文革中做了许多亏心的事。

◇ 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全家被杀与刺周有关？

问：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全家被杀，据传与未执行林彪下令炮打周的专机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据我所知，谭甫仁被杀是昆明军区一个保卫科长干的。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位保卫科长被查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准备要审查他，采取组织措施。结果走漏风声，他铤而走险，杀人泄愤。他是管保卫工作的，对军区大院里首长住地非常熟悉，枪法又准，在一个黑夜，下手得逞。事情发生后，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周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都提到这个案子。

问：书中谈到不知是谁挑起珍宝岛事件，从当时国内政治情况来看，毛泽东是不是在有意利用国际事件转移众人视线，扩大与苏联的矛盾？

高：当时国内局势还没有从文革大乱中稳定下来，各地两派打得一塌糊涂，难于收场。但我是历史学者，要根据事实说话。到目前为止，没有史料证明这是毛为了安内而有意挑口。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我采访过乔冠华，当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参与中苏谈判的中方团长，他也搞不清楚。

不过，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实际上是偶然中的必然。毛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中苏关系从六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争论，文革期间已经发展到两国交恶，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擦枪走火。在三月间珍宝岛事件中，苏联方面吃了亏，但是到了八月，苏联方面在新疆打埋伏，围歼了中国一个加强排的巡逻队。中苏战争已经处在一触即发状态。不过，周当时确实曾利用中苏之间紧张局势，趁势收拾文革乱局，要求各地停止派斗，一致对外。

◇ 林彪“一号命令”到底有没有鬼？

问：珍宝岛事件后，林彪“一号命令”后来成为他一大罪状，这个命令是林彪背着老毛发的吗？

高：林彪背了黑锅。关于一号命令的来龙去脉，最近网上登出一篇根据阎仲川回忆写的文章。阎当时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是从广州军区调上来的，与林彪、黄永胜关系密切。他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当时形势非常紧张，苏联军方强硬派，比如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主张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消灭在萌芽状态。苏联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放风，试探美国人态度，甚至指派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直接找基辛格摸底。美国从他们的战略利益考虑，认为如果让苏联得手，对美国很不利，因此对苏联表示了强硬态度，声称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采取核报复。美国方面这种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让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的战祸。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毛也意识到形势严重，亲自在二十年国庆口号中加了一条，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防止核大战。林彪一号命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根据毛对形势的判断，林彪下部队视察，并发出了军队加强战备的电话指示。总参作战部根据林彪口述的四条，起草了一份通报，要求全军贯彻执行。问题出在通报没有按照总参作战部的文件编号，而是把标题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这本来是下面干的事情，却给林彪添了麻烦。九大后，毛、林关系已经不大正常，毛对林彪处处提防，这件事更加深了对林彪的疑忌。应该说，作为

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发出这样的指示并没有越权，事后也报送了毛。据汪东兴说，毛看后说：很好，烧掉。

至于战备疏散，把众多党内元老赶出北京，实际上和林彪一号命令没有直接关系，是当时政治局根据毛对形势的判断而做出的决定，不仅党内元老被疏散，毛、林也离开了北京。当时毛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只有周带领黄永胜等人留守在北京西山军委前指。党内军中元老们的疏散是周交代汪东兴办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老干部对他们在战备疏散中被扫地出门气很大，刘少奇和陶铸也死于疏散之中，需要找个替罪羊，于是把账算在林彪身上，让他背黑锅。

问：高先生的书并未发现新的可以证明林彪参与策划谋害毛的可信证据，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似乎不是出自于林彪的思想，林跟毛打天下，几十年来可以说只有毛对不起林，没有林对不起毛的地方。我觉得林彪不至于走到搞政变去推翻毛的地步，而是林立果这些少壮派军官干的。还有就是关于“林彪手令”，我看了许多资料，说林彪手下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见过这条手令，审判时手令似乎也没有拿出来？

高：关于林彪是否参与策划谋害毛，是否看过571工程纪要，我在书中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关于林彪事件，我这本书的独到之处，是披露了毛、林交恶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研究史料。九大后，文革运动告一段落，今后怎么搞，毛、林两人在指导思想上有不同看法。毛要搞继续革命，林彪想抓经济建设。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思想，起草了九大政治报告的初稿，标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报告胎死腹中，原因是毛不同意，暴露了毛、林之间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周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林彪的，因为符合他的一贯想法。但是，毛发了大脾气，严厉批评陈伯达以后，林彪和周都不吭声了。林彪对此非常不高兴，九大报告虽署了他的名字，林彪上台前一遍都没有看过，把报告念得磕磕巴巴。

毛、林两人除了存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外，还有就是权力之争。目前海内外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林彪、江青两派在九大后争权夺利，实际上是毛有意在背后挑。九大后，毛对林彪的戒心越来越大，感到尾大不掉，开始动脑筋削弱林彪的权势。毛采取的步骤是有意识地抬举张春桥，造成与林彪争锋的局面。据胡乔木说，九大之后林彪在苏州养病，毛带张春桥去看林彪。毛劈头盖脸就说，我的年纪大了，你的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你看小张这个人怎么样？两人这次谈话非常不投机，不欢而散，由此结下心结。这让林彪感到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不保，为此展开了反制行动。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在书中披露了与大陆官方完全不同的说法。根据当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吴法宪回忆，汪东兴从武汉回来传达毛是这样讲的，要设主席的话，看来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毛在这里实际上是虚晃一枪，试探林彪态度。林彪身边本来就有叶群在一旁撺掇，而他自己也正为毛流露出换接班人的打算弄得惶惶不安，所以想利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试探毛对他的态度，巩固和捍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才是毛、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过招的表里文章。不明了这一点，就会雾里看花，无法理解对毛、林在庐山会议上的翻脸。

还有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突然袭击”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对世人撒的弥天大谎。事实上，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讲的。在庐山会议开幕前，毛和林彪两人在小休息室里关起门来谈话，林彪向毛表示他准备讲话，批评张春桥反对提“天才”的问题。毛不仅同意，而且还告诉林彪这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只是让林彪不要点名。

我查过林彪讲话原始记录，他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当然，林彪也搞了小动作。毛发现

林彪的讲话大受欢迎，党内文革派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危及自己的根基，于是展开反击，与林彪闹翻。只有把这些内情摆出来，才能理解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为什么愤愤不平，拒不检讨。

林彪是否策划谋害毛的问题，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悬案，既不能坐实，也不能完全否认，因为毕竟有许多揭发交代材料，不能说都是逼供信搞出来的。至于这位先生认为571工程纪要，连思想都不是出自于林彪，对此我持有不同意见。林彪虽然未必看过这份东西，但文中主要思想却显然来自林彪。像林立果这样少壮派军人即便再有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入木三分，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能有的那种感觉来。

林彪虽说平日沉默寡言，不大过问家事，但在大事上是要由他来拿主意的。这是林彪的个性和在政治上的地位所决定的。谋害毛此举非同小可，如果没有林彪点头，至少是默许，林立果是决然不敢轻举妄动，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历史真相还有待于知情人和专家学者的共同挖掘廓清。

问：邓小平说，假如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拖这么久，到底该怎么看？假如没有周，文革又会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假设一下？

高：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应该说，邓评周的两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把周在文革中的历史功过客观地摆了出来：如果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这是当年邓在党内总结文革教训时说的，点出了周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文革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文革的补救者。这两种角色互相矛盾渗透，相反相成。作为参与者，周要对帮助毛发动文革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灾难，避免了大崩溃。作为文革补救者，周对文革的狂暴，毛的极端虽作了某种限制，却无力回天，客观上延长了文革的灾难。

至于没有周文革会怎么样，也可能结果会好一些，也可能会更糟。鲁迅打过一个比喻，说看到车子要倒了，有三种态度：第一种人拼命用身子去扛，最后车子还是倒了。第二种人，看到车子要倒，他不管，等车子倒了以后再帮著扶起来。第三种人，看到车子要倒了，上去狠狠踹一脚。周就是第一种人，他在文革中的作为究竟是正面作用大，还是负面作用大，恐怕是因人而异，屁股决定脑袋，看法截然不同。

◇ 如果周恩来当了中国第一把手

问：您认为如果毛死在周的前面，周有无勇气接过第一把手的位置，如果有，他将如何作为？

高：周在历史上有几次当党内军中一把手的机会，但他都没有做。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在纠正党内立三路线时，还有一次是在遵义会议后。周比较喜欢处在掌握操作实际工作的位置，从旁帮助一把手领导全局。这是周的个性气质使然。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以张良、诸葛亮自勉，辅佐雄主，成就历史大业。周在参观张良故居、诸葛亮祠堂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是当助手的，而不是挂帅的。

林彪事件后，毛在精神上受到重创，大病一场，在1972年初，突然昏了过去，人事不醒。周当时正在开会，听到消息后非常紧张，到了毛游泳池住地以后半天下不来车，大小便失禁（李志绥的说法）。周这样失态，是和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有关，再加上事出突然，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当毛在病中交权时，周诚惶诚恐，难以从命。在毛病情稳定之后，周马上又通过张耀祠传话，表示还是要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周这样做，也有深知毛嗜权如命的秉性，不想犯忌。

毛如果真死在周的前面，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时恐怕是形势比人强，周也会当仁不让。我想根据周的为人之道，再加上对毛的忠君情结，在毛之后，大概不会采取断然措施抓“四人帮”，弯子也不会转的那么急。但是，周势必要解决中国是继续走文革之路，还是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这是无可回避的。我个人认为以周的治国理念，周会运用他在党内外的美誉，运用他个人的政治手段，采取迂回缓进的办法，完成这个转变的。

问：是否可以说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从来都得“如履薄冰”？从文革毛倒刘，到后来倒林，周是否看到作为毛的二把手都没有好下场，而甘心做第三把手？

高：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没有好下场，主要是在中共建国以后，在此之前倒不存在这种情况，尽管党内斗争也十分残酷。这固然与毛嗜权如命的品质分不开，但更主要的还是政治体制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上，不能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没有了退路，下场不是阶下囚，就是死于非命，尤其是在毛时代。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刘少奇被打倒后，想带著老婆孩子回家务农，林彪在和毛闹翻后，也曾想回家养老，不问政事，但是都不可得。

邓时代的党内斗争有所缓和，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严酷，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好下场。胡背著黑锅，抑郁而死，赵至今还在囚禁之中。中国政治制度本身有问题，缺乏西方政治制度下当政者可以全身而退的文明。

周一直处在中共领导核心圈中，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他深知毛的为人和党内斗争的凶险残酷，再加上他为人个性，所以有意避开旋涡，表白自己不是“挂帅”的，甘愿做助手，“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周语）。但是，这不以周的意志为转移。林彪事件后，他被历史推上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由此大祸临头，经历了晚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在忧惧中度日，最后抑郁而终。

问：要是毛岸英韩战不死的话，是否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高：这又是一个假设。（众人笑）不错，毛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因素。可以说文革是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毛个人意志相结合的怪胎。毛对毛岸英是很看重的，有意把他放到下面，精心培养，为日后接班积累本钱。如果他不死的话，毛很可能把班交给他，即便名义上不是，至少也是实际上掌握大权，成为毛家天下。

那么，毛是否就不会发动文革，中国老百姓就因此免受文革之苦？我看不一定，情况也可能更糟。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岸英为人个性很强，喜欢表现自己，在朝鲜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他当时不过是个随从身份，却在司令部会议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这样的人如果掌了权，中国老百姓处境却可能更悲惨，恰如今日金正日统治下的北朝鲜。

◇ 档案“保密”等级以涉及领袖负面形象划分

问：您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曾为官方编写周恩来传，官方会给你提供所有真实的原件吗？

高：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十分严格的。历史档案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为了保管，控制得很严，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更是慎之又慎。

大体上说，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馆，一个是中央档案馆，负责管理中共中央和党政各部门



的档案，包括中共建国前的所有文电档案。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主要是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自成系统，主要保管有关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归军委办公厅领导。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由此形成的档案，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存档保管。大约十年之后移交中央档案馆。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当年主管党史研究的胡乔木曾考虑搞一个档案解密制度，准备三十年后公布。但是六四后便不再提了，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

我原来所在的文献研究室，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人物的著作、传记、年谱的官方权威机构，所以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中的需要。不过在单位内部，阅读档案的制度还是很严格的，严格按照级别、专题研究来阅读。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档案原件，处一级可以阅读的档案等级就高一些，局一级就更高一些。总之，级别越高，能够阅读档案的范围就越大。

所谓档案的“保密”等级，说到底是以涉及到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指责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我那时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又是室务委员，担任过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档案的阅读范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到。不过，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接触了不少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打了报告，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

问：文革期间，周不是不能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道路，他是否在某些时候，对国难、人民的痛苦表现出沉痛心情，对整个局势表现出忧心忡忡，还是他一直三缄其口，永远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看法？

高：周在文革中眼见整个国家陷入大乱之中，内心痛苦和矛盾不时流露出来。这是他与毛、江一类人不同之处，我在书中反映了这一点。周在文革中的内心矛盾之处在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在政治上要跟著毛走，又不忍坐视国家陷入动乱不管，而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所佩戴的那枚毛像章就是这种内心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像章一边是毛的头像，另一边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毛是文革灾难的制造者，既然要跟著毛走，就无法解民于倒悬，脱离苦海。而且周本身就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无法既忠于毛，又爱民，因此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一方面，他看到陕北老区老百姓生活困苦而落泪；另一方面，却又不肯向毛大胆进言，结束文革，抓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他在林彪事件后的嚎啕大哭，就是这种无奈心情的一种表露。

我理解这位先生对周同情理解的心情，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周氏晚年处境和性格的扭曲，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改造国民性，除去臣民心态，培养公民社会的健全人格。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要从自己做起，讲真话，拒绝说谎，或者像周那样说“违心之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

若大陆解禁愿捐此书稿费成立促进知情权基金

高：听众递来条子，我念一下：“文谦家兄，……兄借职务之便，掌握大量档案资料，当然便于著书立说，这些东西不是私产，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价值一万、十万、百万、千万，算得

清吗？而兄在异国他乡私自占有随意运用，合适吗？”

中国老百姓是中国的主人，有权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文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事情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大陆官方却还是极力掩盖封锁文革历史的真相。我写书只不过是还原本就属于人民的知情权。

这位先生以为我写书发了大财，成了富翁。这位先生显然是个外行，不大了解海外中文市场。我这本书虽然在海外热卖，读者却主要在大陆。说句实在话，我写这本书所获得一点微薄收入，远不够我几年来所投入的劳动成本。这些年来我一直是靠妻子为生。至于这点微薄的所得，我准备用来再生产，写一部文革史，告诉国人历史浩劫的真相。现在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成了禁书。我想拜托这位先生一件事，希望能说服中国政府，把这本书解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将非常感激，把在中国大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基金会，促进还国民知情权这件事情。（热烈鼓掌）

~~~~~

### 【前朝旧事】

聂元梓谈周恩来

• 行 云 •

问：你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吗？

聂：接触多次啦。我觉得周恩来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周也有不少缺点。我觉得他很会处事，很忠于毛泽东。不论大事小事，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是从。关心，关怀毛泽东、真心实意地体贴，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全知道。毛泽东喜欢什么，他一定能做到什么。所以他做出的事情都是毛泽东赞同的，他不管客观情况怎么样。……我对他有两点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一是，他也说瞎话。对于周恩来，我感觉文化革命期间所有被揪斗、被关押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保护还是真正要关押的，他都签字。那时枪毙了一些青年，我没有根据，但我相信也是他签的字。

问：包括遇罗克吗？

聂：当然包括，我还亲手办了一次。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才明白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问：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

聂：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杨勋有一次同杨柄章去见江青，当面顶撞了江青。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

问：您知道要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吗？

聂：不知道。再来说周恩来。周对毛泽东是必恭必敬的。我们也很崇拜毛泽东，但你是国家的大总理，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周恩来还有一个特点，反对过他的表扬；拥护过他的，遇到危难的事情，他从来不保护……我后来对他是有看法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批斗杨余傅。周恩来讲了江青很多好话。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会上，把江青说得更好，说她是三十年代同鲁迅一样的战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当时为什么吹捧江青？因为那天毛泽东就在幕后坐着呢！

□ 摘自香港《开放杂志》五月号刊登

## 【往事追忆】

### 文革初期大学生造反原因与“北航红旗”的成立

• 老 田 •

#### 一、文革初期的形势

大学生开始造反时候，是在毛主席批准播发大字报（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编者）之后，也就是1966年6月1日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北航还不出名，蒯大富比较出名。我们学校的运动都是从清华北大那边引过来的。

北航是个半军事学校，学生入学是按照当兵的标准挑选的，大学生录取按成份，以工农子弟和军队干部子弟为主，地主富农出身的一个没有。清华、北大出身不好的人多，地质学院也是那样，他们造反派也有他们的不满。后来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个分歧，与这个情况有关，北航支持出身好的一派，实际上偏“保”，地院支持激进的造反派，我们开始反对极左。

造反派也不一定都是好人，清华的“四一四”就是这样的。

#### 二、文革开始的北航工作组

我是北航3511班的学生，是63年入学5系，班里有25个人。有一个石兴国，他是南京人，他父亲是省委书记的秘书。那时候几个人去北大清华回来，也写大字报炮轰党委，但是没有什么依据，无非就是说他们生活腐化、喜欢跳舞，再有就是他们常常勒令工农子弟退学等等。

那个时候造反最起劲的一帮人，都是高干子弟，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李明清和赖锐锐后来在文革中被斗死——编者），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清林，铁道部长的儿子苏小泉，他们几个为首的炮轰党委特积极，写大字报是6月10号左右，比我们早，而且点了书记的名字，他们有内幕消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显山露水，他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北航。

接着工作组就派下来了，组长是国防科工委八局局长赵如璋，也就是10号左右，工作组来到北航就一个调子，支持群众斗党委，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大字报就搞得黑白不分，党委也瘫痪了。书记王洪、副书记周天行停职反省。大概是在6月15日到20日，全校革命师生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揪斗黑帮，我们当时没有参与，持观望态度，工作组支持

高干子弟斗黑帮，北航斗了40—50人，清华斗了150人。

### 三、文革的转折点

6月20号，赵如璋召开大会，说北航的斗争形势复杂尖锐，王八蛋很多，不一定光揭发党委，要全面开花，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发谁。这一下就彻底热闹了，北航教职工1万多人，平时相互有些矛盾的都发泄出来，结果是全院开花，相互混战一团，运动的矛头就这样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

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工作组不对，完全是胡来，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把文革引向歧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就开始串连，寻找与我们观点一致的，班上有一大半同学同意我们的观点。

首先是石兴国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一条无头的黑线……》，主要内容是说北航揭发出来这么多问题，主要是从国防科工委批发而来的，这是一条黑线，要往上揪。这个大字报是我看着他写的，就是两张纸，写完之后贴在八号楼。我的书法不错，自己也拿了几张红纸，说是坚决支持石兴国的革命行动，还说鉴于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赵如璋不再适合领导北航的文革，建议国防科工委撤换赵如璋，另外换人。我的大字报也就是大标语式的，然后签了名，贴在石兴国的大字报旁边。

北航的文革运动从此波澜再起，当时就乱了套，支持的和反对的都有。说我们要踢开工作组，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大部分人不表态，少部分人暗地里支持。当时又是照相，又是摄影。6月22日，工作组召开大会，宣布我们是反革命大字报，要组织全院进行辩论，深入批倒批臭。

6月23日又举行大辩论，大字报全部针对我们，指着我们骂。各个单位和教研室都轮流批斗我们，501教研室要我低头认罪，405教研室书记孔令华组织批斗我们的时候，上纲上线。不过那时保守派还没有开始武斗，动手打人。6月27日大辩论，全院面前正式围攻和批斗我们。

然后就部署在各系都要抓类似的人，每个系都排了黑名单，一两百人。在整我们的时候，没有隔离，只是剥夺了政治权利，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抗美援朝”誓师大会，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集中在二区食堂，蹲在地上听广播。

我是烈士后代，父亲是武工队长被敌人抓住活埋了，2岁丧父，13岁丧母；爷爷是民兵队长，被国民党还乡团大卸八块；叔父是区委书记也被敌人杀害；堂兄是团委书记。因为我出身很好，一家四个烈士，那些个高干子弟就说我背叛了家庭出身。

有些高干子弟写了大字报贴在我的寝食门口，说我是反革命。我当时21岁，血气方刚，不过就是建议把组长换掉，也没有把赵如璋打成反革命，要求另外派人，对党还是相信的。心里一口气出不来，晚上爬上6号楼顶大喊大叫了一阵，喊了半天也没有人，下来之后跑到教室里，拿刀划破手指，写了血书，说自己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

### 四、血书的效应

工作组住在专家小楼，我敲门进去，赵如璋问我是谁，我说是来交检查的，请他看后转交中央和毛主席。他看到血书之后，受了一点震动，态度马上缓和了一点。他把血书交给旁边一

个很富态的女军人，要她锁进铁皮柜里面。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也述说了我的家史，继续反工作组，要求他们承认错误，撤离北航。很多人知道我写了血书，全院一下子翻过来，许多人公开支持我，还有许多人到我的宿舍里来慰问、访问并表示支持。

石兴国以后没有了行动，我就成了主要目标。大概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突然中央通知工作组找少数派的代表去人民大会堂，石兴国去了，毛主席出来接见，工作组灰溜溜的。第二天就宣布撤走。

我们这些挨了整的人，认为工作组不能就这么撤走，必须检查，为我们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起初支持我们的人，也就是第一批起来造反的，大约两千来人，学生中间还有两三千人的中间派，中间派组织东方红一两千人，反对我们的有几百人。保工作组的主要是老工人，他们对党的感情深，写标语说热烈欢送工作组胜利返航，还有大标语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

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号召支持我们观点要求工作组检查的人，做红灯笼；高干子弟就做了绿灯笼，晚上就发生了“红绿灯笼大战”，主要是显示声势和力量，也有相互吵架和动手推拉的。

第二天工作组还是走了，留下了一个文革筹委会，我们称为“伪筹委”，主任就是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毛主席 8 1 8 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平反。

## 五、成立北航红旗

他们拉的一个班子，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不承认这个，称为“伪筹委”。

有人贴出一张红纸来，通告说从今天起，北航红旗战斗队成立，愿意参加的请到主楼 1 2 5 教师登记，署名是“田东”。谁也不知道田东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盛喜延，是排球队的。

这一天是 8 月 2 0 日，那天晚上登记的有 1 0 7 0 人，以学生为主，有部分教职工。也没有开什么成立大会，大家就好象是在展览会上签到簿上签到似的。大家都认识我，就公推我作为联络人，就相当于是一个召集人。

参加的女同学也不少，有的女同学就绣了两面红旗，第二天早上把红旗插上，几个骨干都是自动涌现出来的，2 系的涂海鹰站在凳子上讲演，他说：红旗战友们，不能让工作组这么便宜的走了，上国防科工委去要求他们回来检讨。又有一个小伙子举着一面旗帜走过来，叫跟我走，这就是三系的韩爱晶，他是 6 4 年入学的。还有四系的侯玉山。还有一个仇北秦，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胡子，他老子也是高干是萧劲光的部下，是孔令华筹委会的成员中间的反对派，同情北航红旗。

## 六、揪工作组成功和“让贤”

这样涂海鹰为首，韩爱晶带队，举着两面旗子，一百多人步行去城里，沿途呼喊口号，走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西大门，大队人马后来才来。我们到达国防科工委门口的时候，想要冲进去，但是冲不进去，那里戒备森严，总参、总政和国防部都在大院里。这么多的人在军事机关门口闹嚷嚷，是建国以后没有过的，有干部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说我们是反革命。

这个时候，高干子弟们参加了联动组织，也到国防科工委门口跟我们闹。他们还算是给我留了点面子，没有动手打，对地质学院他们是打，对北航没有打。他们天天找我，要我参加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情，把队伍从国防部门口撤回去。我就反过来劝他们要与老子划清界线，参加我们。我们在那里坚持了28天28夜，坚持要揪工作组，这在北京是第一家，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这个事情倒是没有怎么追究。

静坐的时候，通常保持几百人的规模。我就回去找孔令华，要安排送饭，韩爱晶和井冈山在现场顶着。

后来刘志坚出来了，说门口这个地方车进车出，是不是撤进旁边的体育馆。我们就每天三五个人在门口值班，在那里坚持了28天，每个人都减了十斤八斤的。我就每天跑来跑去，搞后勤工作。王大宾他们也在地质部门口坚持。中央没有人表态，赵如璋就是不出来。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北航红旗的领导班子就是在静坐过程中间，自然形成的。期间李纳还化装来侦察过。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那里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来了两辆小车，问我们的负责人在哪里。我、韩爱晶、涂海鹰都在，看是陈伯达和王力来了，我们都非常感动。陈伯达说我和王力同志来，就表明一种态度，你们懂吗？同学们欢呼雀跃。陈伯达接着说，回去吧，胜利在等着你们。王力说，我们一开完会就赶来了，听说你们是少数派，少数派是优秀的，我们支持你们。

后来才知道，我们再那里静坐的时候，中央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老师要镇压，中央文革支持，最后是林彪出来表态，陈伯达立下军令状。林彪说，赵如璋不出去，就派人把他押出去。陈伯达立下军令状说：国防科工委赵如璋、罗舜初同志到北航去，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被打死，陈伯达甘愿抵命。

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底了，北航红旗出了名，回到学校一下子就膨胀到四五千人。我自己是个农民子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有点承受不了，现在那么多人，就要把位置让给韩爱晶。那天撤离的时候，我就这个想法征求大家意见，有人批评我是半截子革命。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张通告贴在体育馆，说很感谢战友们的信任，现在胜利了，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辞去，建议韩爱晶同志为负责人。在静坐期间，韩爱晶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早先没有挨整所以不出名，我就给大家做了介绍。韩爱晶也很感动，大家都掉了眼泪。

第二天，北京市有人通知北航红旗负责人去市委开会，丁国钰发了一张请柬，十一和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门。我把请柬给了韩爱晶，他是个穷学生，也没有什么好的装束，去见毛主席也没有什么讲究的条件，就在9月30号下午穿着一双破塑料凉鞋住进中南海。第二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朱成昭等四人，我在家里接了一个新华社记者的电话，他们在准备报道中间要落实北航是谁上天安门，我告诉他是韩爱晶。朱成昭作为“二月逆流派”跨了之后，才补上王大宾，这就是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再后来在“两案审判”的时候，韩爱晶作为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让给他的。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